

以「概念」來勾勒近代中國的意義之網：

評方維規著

《概念的歷史分量：近代中國思想的概念史研究》^{*}

Use Concepts to Outline the Webs of Significance in Modern China

Book Review: Fang Weigui, *Gainian de Lishi Fenliang:
Jindai Zhongguo Sixiang de Gainian Shi Yanjiu*

韓承樺^{**}

Chen-hua Han^{***}

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議題、素材豐盛富繁，近年來隨研究取徑、視野變換，迭創新意，既反映史學研究趨向之曲折，也凸顯「中國近代思想」是牽涉多種行為實踐、歷史經驗的複雜課題。而概念史就是此

^{*} 本篇論文以方維規：《概念的歷史分量：近代中國思想的概念史研究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8年）為論述對象，以下引文皆從此版本中援引。

^{**} 作者現為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。

^{***} Assistant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History, Fo Guang University

列新取徑、方法行伍中的一員，在近幾年思想史動向中，展現它開創暨引領議題的能量。概念史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獨特角度，反映研究者對轉型期生發和蛻變之新、舊「思想」成因、內涵、傳播動向暨影響的動態和分層考掘。這方面與歐美思想史自1960年代以降的變化和發展趨勢，若合符節。傳統僅關注知識菁英和經典文本的做法，以及如洛夫喬伊（Arthur Oncken Lovejoy, 1873-1962）於1930年代開創，以考究跨越時空環境之觀念結晶體為主的觀念史（history of ideas）取徑，陸續遭遇劍橋學派（Cambridge School）、歐美社會史與文化史研究，以及德國概念史（Begriffsgeschichte/history of concepts）的挑戰。它們紛自揭露「語言」作為形塑歷史經驗之中介層的作用，循此捕捉外在於思想、概念的重層「語境」（context），以及各色思想「實踐」（intellectual practices）。¹至是，研究者現在得結合「語境」與「實踐」，在特定時空環境、處所，在形色各異的行為、活動展演中，在不同的媒介、載體上，重尋人類抽象思維活動的歷史足跡。

概念史是環繞著「語言」展開，觸及表現於外的「詞彙」，及其承載的各式「概念」，以及相應的社會背景、脈絡。這基本是借鑒於人文學對語言和符號的考究。語言是型構日常生活世界運作的基本元素，人類使用詞彙以表述想法或描述具體事物，每個詞彙負載一種基本概念，是人們因文化背景或生活經驗，形成對世界的認知及想法。於此，語言遂成為反映社會文化變遷或歷史經驗積累成果的介面。²

¹ 關於歐美思想史研究的發展趨勢，相關研究碩果累累，請見以下討論：Anthony Grafton, "The History of Ideas: Precept and Practice, 1950-2000 and Beyond," *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* 67, no. 1 (January 2006): 1-32; Richard Whatmore, *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?* (Cambridge, UK: Polity Press, 2016); Richard Whatmore and Brian Young eds., *A Companion to Intellectual History* (Malden, MA: Wiley Blackwell, 2016).

² 這裡有兩個層次的問題需要說明。首先是人文學界的「語言學轉向」（linguistic turn）的部分，它深刻影響了晚近思想史、文化史研究的方向，引致研究者特別關注環繞著「話語」（discourse）以及人類語言實踐及經

中國近代以降的變動，很大程度就落實在語言、詞彙層面上，諸種漢語新詞在中國愈趨頻繁的對外交往、互動過程中誕生。³ 這也意味著形色不一的新概念出現。以概念史探究中國近代思想史，即代表了史家循語言改變的軌跡，以單一概念或概念群為貯藏思想和社會活動經驗交織共變的媒介，描摹近代中國社會、文化、思想暨其他層理變動的歷史過程。這種以概念史視野，企圖在長時段歷史進程中捕捉社會變化的總體特徵，就是方維規近年撰作《概念的歷史分量：近代中國思想的概念史研究》意欲呈現的場景。

近代中國概念史（或者亦有人稱的觀念史）研究的興起，反映了「語言實踐」成為學人探索中國現代轉型的特定角度。這部分交織了多種歷史場景、實踐行為和經驗，包括人們對域外新詞的翻譯，抑或借取既有語彙意涵來鑄造新詞；通過不同印刷文本傳播新語；新詞在各色情境裡，被不同使用者用以回應特定議題，且針對特定讀者申述其論。這些環繞著新詞、概念的研究，既關涉中國以現代民族國家之姿建構新漢語體系的多方嘗試，更涉及單一詞彙／新名詞／關鍵詞及

驗可能反映的歷史過程。這塊範疇受許多語言學、歷史學、人類學者關注，成果碩累。諸如邢福義主編：《文化語言學》（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0年）；蓋伊·多徹（Guy Deutscher）著，王年愷譯：《小心，別踩到我北方的腳！》（臺北：貓頭鷹出版社，2013年）；丹尼爾·艾弗列特（Daniel Everett）著，黃珮玲譯：《別睡，這裡有蛇！一個語言學家在亞馬遜叢林》（臺北：大家出版，2020年）；「語言學轉向」對史學研究，特別思想史的影響，可參閱：Annabel Brett, “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Now?,” in *What is History Now?*, ed. David Cannadine (Houndmills, Basingstoke, Hampshire: Palgrave, 2002), 113-131. 第二個層次的問題則是，德國的概念史研究其實並未經受結構、後結構主義和「語言轉向」的影響；反而是柯塞雷克（Reinhard Koselleck, 1923-2006）對海德格（Martin Heidegger, 1889-1976）、伽達瑪（Hans-Georg Gadamer, 1900-2002）的詮釋學（hermeneutics）的轉用和回應。兩者有所區別，都專注於「語言」介面上，而概念史更特別提煉出歷史時間形態的面向。陳建守：〈作為方法的概念：英語世界概念史的研究回顧與展望〉，收於蔣竹山編：《當代歷史學新趨勢》（臺北：聯經，2019年），頁177-178。

³ 這部分的討論可見如王力（1900-1986）等漢語研究者的論著，王力：《漢語史稿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），頁501-513。

其承載新式概念內涵的多種課題。⁴ 這般關注「語言」的取徑，其實賦予一種觀察轉型時期思想、文化變遷的新角度。它讓思想、概念元素不再是懸浮於社會、文化脈絡之上，亦非僅限縮於經典文本或知識菁英的手筆中；它是隨語言傳播至各個角落，體現於眾生筆墨、口舌喧嘩之際。

在各種語言實踐中，翻譯扮演了重要角色。自劉禾提出「跨語際實踐」(translingual practice)⁵ 的想法，來源語(客語)、主方語(主語)通過翻譯的轉換，即成為觀察中國現代性生成之切面，更凸顯其中可能的「混雜性」(hybridity)。即如方維規於《概念的歷史分量》指出，翻譯是從事中國近代概念史研究必須注意的環節。作者通過各個概念、概念群型態的考掘，展示了中國現代性思想、經驗的形成，實是透過相當頻繁、多重之翻譯建構不穩定的語言對譯層，由不同行動者在相異的語言擇用過程中，動態地確立現代概念的內涵和雛形。本書細緻勾勒眾多西方概念如何經由繁複地翻譯，找到各種對應語詞，形成一張張詞彙、概念網絡。更重要的是，作者能在網絡中分梳中、西／傳統、現代概念相斥及相涵的部分，析論這些現代譯詞之所以擇定的原因。例如“economy”這章，就很精彩地指出「經濟」這個傳

⁴ 近年關於「語言」的課題概可分為兩大類：一類為環繞著近代「國語」生成的探究，一類則為新名詞、概念／觀念史研究。在後者的部分，近代中國的概念史研究實是結合多個歷史面向，包含語詞史、翻譯史、思想史甚或知識與制度的歷史。前者部分，近年有王東杰：《聲入心通：國語運動與現代中國》（北京：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9年）；黃華：《語言革命的社會指向：對中國近代史的一種傳播學考察》。後者部分研究繁多，較新者如沈國威：《一名之立 旬月踟躕：嚴復譯詞研究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9年）；陳力衛：《東往東來：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9年）；潘光哲：《創造近代中國的「世界知識」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9年）。另有幾個團隊工程，如由孫江創辦的《亞洲概念史研究》以及金觀濤與鄭文惠創辦的《東亞觀念史集刊》，均是定期發表專題研究成果。

⁵ 參見劉禾著，宋偉杰等譯：《跨語際實踐—文學、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，中國1900-1937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2年）一書。

統詞彙與西方“economy”、“political economy”之間的類同關係，說明其內核的「經世」意味，是促使國人用「經濟」接納、表述和評估“economy”相關事務的因素。

但在梳分概念網絡時，《概念的歷史分量》在關於翻譯關係、譯詞認定上則有值得進一步討論處。同樣是“economy”那章，作者將時人使用的詞彙分出幾類，論述其分別與“economy”的翻譯對應關係。其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是「富強」一詞，作者認為它也是當時眾多「譯詞」之一（頁310-311）。但文章卻未能舉出確切的文本對譯關係。作者此論，即是隱約地申述中國古有類似“economy”的概念，「富強」就是表述詞彙之一。同樣手法，作者還指出「養民」亦為“economy”的譯名（頁320）。評者以為，方氏此處的「翻譯」顯是循太過寬泛的定義，且採「倒放電影」的方式，認為這些涉外人士筆下的任何辭彙，都可能是有意要譯應西方新事務的概念。在沒有確切文本對應的論據情況下，研究者只能說明，時人在理解、表達甚至評估經濟活動相關事務時，「富強」與「養民」是很重要、解釋力強的傳統脈絡。⁶

綜觀全書，《概念的歷史分量》十分著重翻譯之於詞彙史研究的環節，卻忽略了翻譯引致概念成形背後牽涉的時間層次。誠如論者指出，若從德國概念史角度來看，翻譯並非一件「共時性」

⁶ 西方“economy”詞彙、概念的翻譯問題，久有人討論。論者有注意到「富強」與“economy”概念引介的關係，但都還未能找到顯示確切對譯關係的材料，僅能強調、說明「富強」概念和傳統「經濟」概念是互斥關係的。金觀濤、劉青峰：〈從「富強」、「經世」到「經濟」：社會組織原則變化的思想史研究〉，《觀念史研究：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，2008年），頁291-293。湯志傑也曾針對從「食貨」到「經濟」的語意演變，說明語詞變化背後所反映的，傳統中國社會各項事務逐步分梳出獨屬於西方定義之“economy”的範疇。湯志傑：〈從食貨到經濟：歷史語意上的二階觀察〉，《當代》2000年第155期，頁100-127。另還可參考 Wolfgang Lippert, “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rm ‘Political Economy’ in Japanese and Chinese,” in *Mapping Meanings: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*, eds.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 (Leiden; Boston: Brill, 2004), 119-128.

(synchronic) 事務，而是具備時間歷程。為理解域外文化所展開的翻譯活動，對於原有概念轉變和新概念成形的過程，就仿如不同「時間層」(layers of temporality) 疊合於概念結構中的複雜過程。換言之，翻譯確實是推進概念轉型的重要轉軸點；亦為我們觀察歷史時間形態的切面。⁷ 詞對詞的翻譯活動，實是濃縮了概念原有內涵、歷史經驗與來自不同時間層之「他者」，在「共時」結構中相遇、協調的複雜歷程。過程中，總有無法轉入現有概念結構中的「他者」，其為積澱於過去經驗而生的概念意涵，可視為「晦澀時間」(obscure time)，這也意指了翻譯實踐中總有難以完全轉譯為「現在」層次的概念內涵。⁸ 換言之，我們還是不能以太過「透明」的角度審視翻譯工程打造之概念網絡。或許，辨析其中較晦澀、朦朧的部分，方為我們重新理解哪些層次的概念與時間，是不符應近代轉型時期之用者。

近代中國思想、概念變遷，確實是在19、20世紀之際，漢語和域外語言頻繁互動的「翻譯的時代」中完成。⁹ 通過翻譯、創造和借用等鑄造新語的方式，中國語言體系逐漸得建立起較穩定，對應西方概念的詞彙系統，進而收束為一張具現代性的「意義之網」。¹⁰ 這是獨屬於近代中國歷史經驗的「意義之網」，不僅凸顯語義 (semantic) 變遷，更指引我們觀察歷史時間在劇烈轉型時期的多種形態。可以這

⁷ Alexandra Lianeri, "A Regime of Untranslatables: Temporalities of Translation and Conceptual History," *History and Theory* 53, no. 4 (December 2014): 473-474.

⁸ Lianeri, "A Regime of Untranslatables," 495.

⁹ 此處「翻譯的時代」是引自沈國威新著《一名之立 旬月踟躕：嚴復譯詞研究》的說法，請見該書序章內容。事實上，通過翻譯吸收外來思想資源，是中國現代轉型很重要的環節，這股風潮一直延續到民國與共產中國時期，只是翻譯的來源語對象有所轉換，從日本轉至歐美再轉為蘇俄。易言之，「翻譯的時代」與思想文化轉型的問題，時代斷限仍可往後續推。

¹⁰ 本文所用的「意義之網」，是借自文化人類學家紀爾茲 (Clifford Geertz, 1926-2006) 的說法。此為紀爾茲對「文化」所下的定義，他採用社會學家韋伯 (Max Weber, 1864-1920) 的說法，認為「人類是懸掛在其自己所編織意義之網中的動物」，而「文化」便是由人類自行編織的意義之網。請參見 Clifford Geertz, *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: Selected Essay* (New York: Basic Books, 1973), 5.

麼說，《概念的歷史分量》的企圖，就是藉由概念史手法，描繪這幅「意義之網」成型的過程。它反映不同階層民眾於漢語現代轉換過程中，透過新詞、概念體系建構一套理解自我、觀察外在世界並賦予意義的新思維方式。這交織了思想史、社會史、政治史……等向度，凸顯利用概念史作為適切取徑的必要性。

本書非常著重在詞彙與翻譯的層次，惟較少在歷史時間形態的問題，以及社會史經驗此二面向上發揮。評者認為，以概念史描繪的歷史圖景，必須包含時間層與社會層。社會層的部分，意指研究者得觀察政治、社會層面的變動，如何表現在語言上，特別是原有概念邊界的鬆動，以及新術語、概念的突破和生成，甚或概念群的浮現。¹¹ 時間層的問題，則如柯塞雷克所述，人類的語言經驗儲藏了社會變遷軌跡，也凸顯不同時間層次的印記。觀察「概念」內涵及演變，意味著結合共時性和歷時性（diachronic）視野，考察概念在時間帶中的意義轉化，以及該概念在特定時空脈絡、情境下展顯的總體特徵。也就是說，從特定歷史脈絡中考掘概念出現、演進發展乃至於消逝於時間洪流中。這般做法，研究者必須注重時間層次差異，以及人類歷史經驗中的幾種確切範疇。包括「經驗的空間」（space of experience）與「期望的視域」（horizon of expectation）兩者，它們分別指向「過去」和「未來」兩種歷史時間的形態。具現概念變化的字詞（words），就必須置於此些時間經驗範疇中觀察。¹²

從時間層觀察語言、概念變化，且從言說層面的變動，離析不同時間經驗的相互疊合、延續甚或斷裂，此即凸顯了德國版概念史研究對於「語言和時間」（language and time）之共變關係，及其研

¹¹ Reinhart Koselleck, "Begriffsgeschichte and Social History," in *Future Past: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*, trans. Keith Tribe 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2004), 75-92.

¹² Reinhart Koselleck, "Two Historical Categories," in *Future Past: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*, trans. Keith Tribe 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2004), 258.

究視野的重視。¹³ 這也就是論者指出，藉由概念變遷進程，以「時間層」的角度思考三種歷史時間型態——過去、現在、未來——如何交疊概念結構中。¹⁴ 而若從時間層的角度來論，本書談及的“intellectual”的「中國版本」——知識分子——究竟只能是個特屬中國歷史情境，無法涵納西方人文、知識界關於“intellectual”概念意涵的語詞？還是它是個舊有「經驗的空間」濃重，但仍保有部分「期望的視域」內涵的複雜概念？而我們今日批評中國尚無西方意義的「知識分子」，這個舉措僅是狹隘地從西方角度所行之批判？抑若可從概念史角度，重新解釋這樣的行為？以及，我們除了說明現代中國的“nation”概念含有傳統根源外，是否還得釐清不同的舊有時間層經驗如何疊加在20世紀傳入中國的“nation”概念結構上，形成怎樣的複雜內涵？

時間層的缺漏，讓人們無法辨析中國的現代概念是由幾種時間層累堆疊所成；社會層的稀薄，則讓我們無法覺察，語言經驗是如何濃縮了社會結構的變動。在這部綜論性文集中，方維規揀選的概念彼此相關，觸及幾個面向：發現及肯認「中國」自身存在並由此描繪對外關係（第一、三章）；通過認識他國狀態來肯定自我發展程度、可能缺陷，並規劃一條可遵循的道路、準則（第二章）；尋找並設計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、經濟制度及相應之思想資源（第四、五、六章）；社會特定階層如知識菁英的轉型及其整體特徵（第七章）。這些分別涵蓋中國現代轉型過程中，因豐富的域外體驗所引致的，在政治、經濟和外交事務、制度的改變和重新設計，以及知識分子如何認識、理解西洋文明，並得反身自省此些層面的歷史經驗；每個層面皆可切出豐富的社會史議題與現象。從此角度來論，

¹³ Cesare Cuttica, “What Type of Historian? Concep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Concepts: a Complex Legacy and a Recent Contribution,” *History and Theory* 51 (October 2012): 412.

¹⁴ Timo Pankakoski, “From Historical Structures to Temporal Layers: Hans Freyer and Conceptual History,” *History and Theory* 59, no. 1 (March 2020): 61-91.

《概念的歷史分量》運用的文獻材料，其實顯得不夠多元，反是大量集中在知識菁英手筆和經典文獻中；也無法展現概念如何「民主化」(democratization)的過程。作者確實如概念史操作方法，挑選了重要的政治、社會語彙，卻在材料的單一狀態下，較難勾勒一個寬且廣的語義場域(semantic field)，以及更多元的語言使用者在不同語境中之操作情狀，讓我們藉以觀察近代社會語義結構轉型的複雜歷程。甚而，本書對於語詞和翻譯相對集中的分析，忽略了語言具體運作所依賴之社會結構，也讓概念歷史的轉換與社會變動之層次，稍微脫了勾。

概念史作為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特定方法，《概念的歷史分量》展示了一定程度的成果，以及部分未盡之處。本書描繪的這張「意義之網」，說明當時知識菁英是經由多種語言實踐來完成，卻忽略了與之相應的社會史層次，以及可藉概念變遷來觀察不同段落「時間性」(temporality)的歷史經驗，由此捕捉概念結構的線性發展亦或斷裂。事實上，概念史讓人更加期待的，是能從歷史時間形態的方法，理解中國現代轉型的過程，如何結合時人於不同時間斷限上活動所積累的經驗，具體展現於某個相同時間點，且還混雜人們對未來可能發展的期望。換言之，我們可藉由概念史所展開的反省工程，是中國於20世紀以降獲取的現代性經驗，將不再被視為西方現代性經驗的全盤移植；而是混雜了中國原生傳統與由此而生發的未來期望。

評者認為，《概念的歷史分量》所呈現的歷史場景，是詞彙史和語言實踐多過於「概念史」涉及之層面。這稍微弱化了從「語境」和「實踐」角度操作思想史研究的「分層」特性，也遮蔽了概念史研究中的社會和歷史時間面向。雖惟如此，本書仍然替後進研究者指引了一條明路，促使更多人投入概念史領域中。未來，或許會有更多人願意從不同方向，例如全球範疇的概念史研究，抑或從單純的文獻史料轉入物質文化層面，探析中國現代轉型歷程中，多元紛陳的概念，究

為何樣。¹⁵

(責任校對：唐雨薇)

¹⁵ Kai Vogelsang, “Conceptual History: A Short Introduction,” *Oriens Extremus* 51 (2012): 9-24. 本文就特別提到，近代中國的概念史研究，或許還得跳脫語言實踐層面，轉入圖像、符號以及其他更普遍性的場域中。早前一部概念史論文集，其中更有「概念和圖像」的範疇，說明概念不僅在語義結構，更在圖像中展演其姿。Iain Hampsher-Monk, Karin Tilmans, and Frank van Vree eds., *History of Concepts: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* (Amsterdam: University Press, 1988).